

田野與文獻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

Fieldwork and Documents:
South China Research Resource Station Newsletter

家族歷史與記憶

百年興衰——一個豫南農村家族的簡史

• 朱仁天

綿延與更新——一個家庭歷史的回顧

• 曹寧

台灣外省籍國軍的日常生活與記憶

• 袁子賢

我家在香港的小歷史

• 黃永豪

活動消息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系統成員單位：

中山大學歷史系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江西師範大學區域社會研究資料中心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廈門大學歷史系

嘉應學院客家研究所

韓山師範學院潮學研究所

編輯委員會：馬木池、張兆和、陳春聲、程美寶、廖迪生、劉志偉、蔡志祥

執行編輯：黃永豪

《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季刊） 第六十八期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合編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出版

出版日期：二零一二年七月十五日

香港科技大學出版技術中心 印製

ISSN: 1990-9020

通訊地址：

香港 九龍 清水灣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編輯部

Fieldwork and Documents: South China Research Resource Station Newsletter Editorial Office

South China Research Center,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lear Water Bay, Kowloon, Hong Kong

電話：(852)23587778 傳真：(852)23587774

電子郵箱 (E-mail address): schina@ust.hk

網頁 (Web Site): <http://schina.ust.hk>

百年興衰

——一個豫南農村家族的簡史

朱仁天
湖北大學專門史

據家譜記載，明末清初，先祖自湖北麻城遷到淮河北岸柳河灣（今河南省正陽縣皮店鄉朱店村）。當時兄弟三人，老大居朱上莊，老二在朱店西北小朱莊（我家這一支），老三到了阮店中心廟（前兩處相鄰，第三處與前兩處相距近百里）。後又從麻城遷來幾批，分居於淮河兩岸。先祖們筭路藍縷，辛勤創業，傳到太祖¹這一代（據推算，太祖生於1770年前後），家業逐漸興盛。至烈祖，有二子二女。天祖（1822-1891）排行老大，為烈祖所器重，送其讀書學醫，醫術高明之後，在朱店開辦了藥房「壽福堂」，名聲漸顯。方圓數十里，求醫者抬轎以迎。由於人口繁衍，土地有限，天祖就在朱店東北十多公里處、毗鄰其岳父的村莊購置田產，另建家園，這就是現在的皮店鄉羅塘村小朱莊。天祖有三子一女，高祖（1858-1924）排行老三，他中過秀才，稍有功名。當時大家庭中共有六十多口人，日子殷實，家業全由高祖管理。據此可知，在整個19世紀，先輩的生活是富足的。

到了民國初年，即高祖的晚年，又在朱莊以東三公里處購置了一處寺院的田產。²此寺名彭大寺，據傳為明朝所建，強盛之時，曾擁有一千多畝土地，每天的香火需用車載運。至民國亂世，西邊晏姓和北邊王姓地主大戶，覬覦彭大寺財產，欺壓和尚。有這樣一個故事：地主派人在住持禪房放了一雙繡花鞋，然後假裝無意發現，並大肆渲染，假借民意，迫使和尚就範。在這樣的形勢下，寺院地產不斷被周圍的地主侵佔，擁有幾百年歷史的彭大寺最終走向破產。時逢朱家的一位長輩在彭大寺做和尚，在寺院排名第三。憑藉這種關係，高祖用了兩車³銀元，向寺院買了180畝地。高祖把好地分給了兩位侄子各60畝，分給自己兒子（曾祖，1878-1927）的則是次等地。當

時這一輩還較富裕，家中擁有成群騾馬太平車⁴。高祖去世後，後人立碑以記。碑的正面是「前清庠生朱連元號炳輝字捷亭之名譽碑」，碑文是當地另一位前清廩生所寫。此碑在文革修涵洞時放到了村口的路基下，為民造福而得以保全，碑座仍在原址。

民國前期，軍閥混戰，基層社會土匪橫行，猖獗一時。⁵1927年，曾祖父被當地土匪抓走，他是個比較吝嗇的人，要錢不給，最終遇害。

當時的家業仍算富有。祖父（1909-1947）兄弟三人，家事基本由老大（大爺，1904-1946）管理，他稍有文化。同村另一位也比較富有的族人，總想欺壓祖父們。他經常勾結土匪，貼票要錢，曾把年幼的伯父（大爺之子，1930-）綁架到數十里外的大林一帶。伯父的舅舅是個保長，有點勢力，曾加以警告，由此結下更大的冤仇。因經常被土匪綁票，每次都要花錢消災，家財就這樣被慢慢耗盡，變得愈來愈窮。最後沒錢了，土匪就燒房子殺人，整個老宅被一把火燒光。為躲避土匪的繼續綁票，大爺到朱店教私塾，把我爺爺與三爺（1916-1988）帶去為同族的地主種地。這就是整個1930年代的事情，現在沒人能夠知道期間的細節，只知道的就是1925年前後的富足，到30年代已被逐漸耗蝕殆盡，變得一貧如洗了。從不多的口頭資料中判斷，家業迅速敗落的主要原因是時局混亂與家族內訌。

1940年，家鄉大旱，然後是蝗災，據傳當時「淹三年、旱三年、蝗蟲下來吃三年」。天災人禍，民不聊生。因年成不收，私塾被迫關門，大爺和爺爺暫住於朱店族人處，三爺到河南南岸做些小本營生。

1941年，大爺通過朋友介紹去了一百多里外（河南省確山縣）教小學。爺爺沒有吃的，無

奈之下，把我曾祖母和伯父、父親（1938-）都送到了大爺處，求得一口飯吃。年幼的父親總是心口疼，疼起來滿地打滾哭叫。由於沒錢治病，就沖服地主家吸食過的大煙灰。伯父說，當時他12歲，每天天不亮就去三里外的地主家討煙灰，地主家門前養了很多狗，見人就瘋狂亂叫，伯父拿着棍嚇得縮在一旁，地主老婆開門送來一小紙包煙灰。每天拿回去之後，曾祖母還捨不得給父親一次用完，中午疼的時候再喝點。冬天天氣再冷亦如是，每天就這樣去取藥。過了約六、七個月，基本止疼了。

1942年蝗災更爲嚴重，蝗蟲飛過時，遮天蔽日，落到地上則密密麻麻。⁶ 這年春夏之際，爺爺去看望其母親和兒子，也想弄點兒糧食回去，同時告知一些家事：三爺的兒子（我叔叔，1942-1993）出生不久，三奶奶就因月子病去世。爺爺在探親的路上差一點餓死，走到大爺處他就躺下起不來了，曾祖母見兒子如此情景，忍不住淒然淚下，趕緊找大麥麵攪麵糊給他喝。爺爺抓住碗再不鬆手，曾祖母告訴他還有黍麵饅，他這才丟開，拿起饅連嚼都不嚼就往肚裡吞。曾祖母說慶倖爺爺撿了一條命，要是再多走幾里可能就不行了。住了一段時間，回去的時候，爺爺帶上伯父，背了12斤蕎麥麵和一些胡蘿蔔、蒜苗。一路上，踩得蝗蟲啪啪作響。走了一天，到處都是死人。眼看有人走得好好的，一倒下去就再也起不來了。

1943年，割罷麥子以後，流落在外的爺爺和三爺回老家看望病重的長輩。吃飯時，行蹤被同族的仇人發現。晚上，他們沒敢留在村裡，跑到了村北的河坡裡睡。半夜裡，三爺聽到有動靜，趕緊叫醒我爺爺分頭逃跑。仇人勾結的土匪在後頭打了幾槍都沒有打中，就這樣死裡逃生。

眼看形勢嚴峻，我們一家人背井離鄉四分五裂，但是仇人還是不想放過生路。此時已忍無可忍，只有拼個魚死網破。秋天，割罷稻子，大爺和他黑道上的朋友商量，派人復仇。當時仇人家有木匠幹活留下的工具，派去復仇的幾個人就用鋸子鋸下了仇人的頭。

殺死仇人之後，1944年初夏，我們這一門的人都回到了老家。但回家定居不到一個月，三爺

就被拉壯丁拉走了，大爺在夏季也被拉走。爺爺因爲有些耳聾沒有被抓。家中除了爺爺、奶奶、年邁的曾祖母，還有就是年幼的伯父、姑姑、父親和叔叔。迫於生計，爺爺讓伯父去給別人做長工（稱作去「跟人」），挖地種菜放牛，幹了幾個月，秋收後回家。那時天氣已經冷了，曾祖母和爺爺讓伯父去程道榮部隊⁷ 找我三爺。走時帶着黍面饅，沿路從汝南到項城，吃完乾糧一路討飯，終於在項城一個叫壩頭鎮（音）的地方找到了我三爺。年輕的三爺（當時28歲）看到年幼的侄子（當時14歲）孤身一人走數百里路前來探望自己，一見面眼淚就啪啪往下落。伯父跟着三爺在部隊呆了六、七天。返回時三爺給伯父帶了一些杠子饅和票子，到家後家人爭相品嚐部隊的杠子饅。之後不久，大爺從部隊開小差跑回家，然後又去西小朱莊辦學，後來眼睛失明，於1946年去世。

大爺去世以後，爺爺得了腿腫（丹毒病），不能下床。三爺當兵在外，家中曾祖母、父親、叔父等老的老小的小，家庭重擔落到了奶奶一人身上。爲給爺爺治病，奶奶到處拜神求巫婆，弄些神水假藥。前後持續半年多，錢花光了，病卻沒有治好。爺爺就這樣在38歲那年（1947年10月）英年早逝。

那兩年，伯父被拉壯丁的先後拉走了六次。前五次都是因爲個頭太小，送到縣城後沒有驗上，然後一路討飯回了家。最後一次，在1947年初夏季節，伯父終於被送到了國民黨地方部隊。伯父走後不久，三爺就從部隊逃了回來，後來是他料理了我爺爺的後事。

1948年7月，曾祖母去世，三爺主持了安葬事宜。幾年裡，家中頂樑柱先後去世，境況極爲慘澹。

伯父到部隊後，駐紮於信陽一帶，1947年在桐柏起義，於黃龍寺受訓十個月後擔任偵察兵，活動於信陽、羅山、確山、嵯岬山、上蔡、臨泉、潁上及阜陽等地。淮海戰役中，伯父所在的部隊開赴安徽蒙城參戰，歷經九死一生。1949年，戰役結束，部隊整編，參與剿匪。後又改編爲中南水利建築八師到藕池口參加荆江分洪，工

程結束，1953年轉業回到家鄉。1956年8月支援大西北到西安工作，現已離休。

從以上經歷可以看到，民國時期，是家族最悲慘潦倒的一個時期。這時的情況是支離破碎，艱難度日，無數次死裡逃生，在困厄中維繫了家族的血脈。這種狀況，主要由動盪的社會大環境所造成，但也有內在的因素。家族史是國家史民族史的一個縮影。一個家族在社會階層中的位置越高，越代表進步的潮流，就越走在時代的前列；反之，位置越低，越保守落後，對時代的反應相對越遲鈍，更易為時代所拋棄。長遠來說，決定這個位置高低的主要是思想文化程度。清末民初時期，家族中沒有在富足生活的基礎上培養出更多的讀書人，大概是最大的失策。有道是：「有田不耕倉廩虛，有書不讀子孫愚」、「欲昌和順須為善，要振家聲在讀書」。⁸

1949年以後，中國社會發生了眾所周知的巨大變化。我們一家人雖然有了穩定的居所，不再流離失所、四處逃難，但艱難的生活處境卻絲毫沒有改善，反而又一次次瀕臨於生死邊緣。在爺爺和曾祖母先後去世之後，三爺想與奶奶合為一家。奶奶在徵詢娘家意見後，決意不從，亦不改嫁，獨自帶着姑姑、父親和一個年幼的叔叔（不久夭折）艱難度日。當時家裡尚有14畝地，三間房。由於沒有牲畜，田裡地裡，全靠奶奶一人之力，溫飽問題無法解決。在傳統農業生產中，耕牛是一種不可或缺的生產工具，尤其在人力不足的情況下。經過一番努力，把家中值錢的東西都賣了，最後終於買了一頭牛。父親從此開始放牛，到前些年家中不再養牛為止，父親與牛打了大半輩子交道。買了牛之後，家中境況仍是一貧如洗。尤其是春天青黃不接之時，每天都要挨餓。父親放牛，臨近中午，和別人一樣回家，但看到的卻是祖母揭不開鍋，父親只好揉揉眼睛牽着牛又出去了。洋槐樹開花的時候，父親每天放牛前都在兜裡裝上一把炕焦的槐花，餓的時候吃上一點。父親說，那時他什麼樹葉都吃過。家中生活資源嚴重匱乏，為了買鹽吃，把爺爺留下的扁擔和茶壺都拿去換錢了，家中的案板和碗都是舅爺家接濟的。冬天沒有棉衣，父親穿着單薄的

衣服在冰上玩耍。過小年時，賣了六根蜀黍（高粱）杆，換了些敬祖用的紙和香。這段父親記憶中最難熬的日子，發生在1949-1951年前後約有兩、三年的光景。那時，雖號稱解放，但基層政權還沒有完善，沒有任何政府力量來提供救助。約在1952年土改之後，生活才稍有好轉，挨餓的情況才有所減少。

由於奶奶沒有接受三爺的闖家要求，三爺從此記恨在心。奶奶和父親經常往地裡抬糞，時間久了，地裡踩出一條小路。經過的政府領導看到孤兒寡母太過艱難，決定減免我家徵稅任務。三爺聽說後，橫加阻撓。父親說，那時吃的很多苦都是由三爺的干涉造成的。從這種情況似乎可以看出，中國傳統的宗族意識在此時已經瓦解。離亂的年代給個人留下的不僅是痛苦的記憶，更有扭曲的心靈。

土改時，我家有14畝地，被定為貧下中農身份，原有的土地沒有增也沒有減。後來，農村成立了初級社，到1956年前後又轉為高級社，生產資源經作價補償後全部歸公。1958年，河南省率先發起了農業生產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我村和鄰村一起開了一個食堂，個人家庭不准生火。在漸漸生成的集權體制下，基層幹部官僚作風大長，幹部訓人打人是常有的事。在共產風的猛烈煽動下，極左路線造成的災難迅速來臨。1959年，信陽地區發生了大面積餓死人的事件。據官方資料記載：

1959年冬、1960年春，信陽地區發生了嚴重的死人事件。據統計，全區死亡百餘萬人，佔全區人口總數的百分之十三，死絕五萬多戶，村莊毀滅一萬多個，牲畜死亡二十一萬多頭。破壞嚴重的地方，大量田地荒蕪，房屋倒塌，十室九空，一片淒涼。⁹

當時駐馬店地區尚未成立，我家所在的正陽縣屬於信陽地區管轄，死人共計八萬多¹⁰（我縣現在人口80萬）。父親說，當時不是沒有糧食，公社政府在下面的村裡設有不少糧庫，但沒有上級

的命令，誰也不敢去動。我村當時約五、六十口人，被餓死一人，算是稍好的，周圍村莊就嚴重得多，每個村莊被餓死的都有十多人。那個村莊的幹部表現積極，那個村莊餓死的人也就越多。1959年的冬天，爲了活下去，父親曾到北部數十里外的王店一帶，在人家已經收穫過的紅薯地中找些紅薯根吃，度過一段難熬的日子後才回到家中。

經歷了餓殍遍野的歲月，飽嘗了忍饑挨餓的時光，出身低微的父親，養成了任勞任怨的品性。父親的勤勞在當地是人所共知的。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集體勞動多，經常修水利，挖溝渠，不分白天黑夜地勞作。大概在70年代一次挖土中，父親用力過猛，肋骨累斷，導致嚴重駝背。駝背的父親依然沒有停止過勞作，在我的記憶中，父親總是閑不下來，總有事情做。大姐曾說，父親這一輩子吃的苦，是別人的幾倍。作爲後輩，我永遠也體驗不到父親所經歷過的心酸和痛楚。我甚至不敢去問，怕觸動了父親心底深處的那些巨大的創傷。以上這些不完整的往事，是平時從父親和家人口中聽到的零碎記憶。

父親雖然不識字，但他很尊崇知識、尊重有文化的人。他對知識的這種態度，可能多少受到祖輩的影響，我覺得這是很珍貴的。有的人相反，有知識但並不尊重知識，把知識當作一種工具，這很難說具有真正的文化素質。正是在父親的影響與支持下，我們兄弟姊妹四人都讀了書。

大哥出生於1962年，他繼承了母親要強勇敢的性格，據說從小就在同伴中出類拔萃。對於這個多災多難的家庭來說，大哥的出生無疑給全家帶來了幸福與希望。奶奶對大哥的疼愛不言而喻，至今大哥還會說起這些事。可惜在教育荒廢的70年代，大哥沒有受到很好的教育，曾一度輟學，後來又得以繼續完成學業。我本來還有兩

個哥哥，卻均因父母忙於生產疏於照看而溺水夭折。70年代，生活雖然比以前又有進步，餓肚子的情況不很多，但物質還是極度地匱乏，幸福生活遠遠談不上。記憶中，小時候父母經常生氣，不是因爲貧困的生活是不會這樣的。

到了上世紀80年代，這是一個朝氣蓬勃的時代，萬象更新，生機煥發。農村包產到戶，農業生產雖然還是原始的手工勞動（我村裡的第一台手扶拖拉機是1985年買的），但生活「在希望的田野上」，充滿幹勁。1985年春節，伯父一家從西安回鄉過年，這是少有的一次團圓。1986年，侄兒出生。同年，哥哥從教，開始踏上工作崗位。1987年我轉到鎮上讀小學，每天放學都能聽到電影院大喇叭播放《冬天裡的一把火》、《信天遊》等流行音樂。記憶中的童年是美好的，在學校也很自由快樂，學習沒有一點壓力，但我的成績卻總是很好。我慶倖自己的少年時光生活在自由向上的80年代。

90年代之後，家族中每個家庭的物質生活狀況都有較大的好轉，文化人也多了起來，社會地位有所提高。雖然我們兄弟姊妹都還在爲各自的生活而努力，但對父母來說，這時才真正迎來了自己的幸福生活。

在1949年以後的這個階段中，我們家族的情況就像中國社會一樣，追隨着時代的腳步，進行着艱難的復興，途經磕磕絆絆，卻始終在艱難地進取。

現在，家族中又組建了一些新的小家庭，大家都在爲各自的美好生活而奮鬥着。但我們從何而來，這是任何時候都不能忘記的。祖上的榮耀是我們的驕傲，祖輩的艱辛更讓我們知道生活的來之不易。不忘家史，艱苦奮鬥，方能對得起先輩們流下的汗水！

註釋

- 1 按傳統稱謂：生己者為父母，父之父為祖，祖父之父為曾祖，曾祖之父為高祖，高祖之父為天祖，天祖之父為烈祖，烈祖之父為太祖，太祖之父為遠祖，遠祖之父為鼻祖。即：父、祖、曾、高、天、烈、太、遠、鼻。下文皆循此稱謂，亦為避先人諱。
- 2 這就是我現在的老鄉所在地。
- 3 當時的獨輪手推車。
- 4 過去是豫皖一帶的重要運載工具，因其滾動起來十分平穩而得名。四輪，呈長方體，長約兩米，寬約一米四五。重約300公斤，一般家庭不會擁有。
- 5 英國學者貝思飛（Phil Billingsley）的專著《民國時期的土匪》（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第三章，〈「土匪活動的搖籃」：河南土匪的分析〉對此有專門介紹。⁶ 1942年夏到1943年春，河南發生大面積旱災，夏秋兩季大部絕收。大旱之後，又遇蝗災，饑荒遍及全省110個縣。據估計，1,000萬眾的河南省，有300

萬人餓死。1943年2月1日，《大公報》發表了記者張高峰發自災區的通訊〈豫災實錄〉。美國《時代》週刊駐華記者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在其著作《中國的驚雷》（*Thunder Out of China*）中也有專門記載。白修德、賈安娜著，端納譯，《中國的驚雷》（北京：新華出版社，1988）。

- 7 豫南一支比較大的地方武裝。1944年初，程部發展到4,000人，被國民黨豫南挺進軍總指揮張軫收編為十三縱隊，程為少將司令。1945年8月在正陽起義，編入新四軍五師李先念部。
- 8 《增廣賢文》。
- 9 中共信陽地委，1962年7月10日，《關於路憲文在「信陽事件」中所犯罪惡的處分決定（草稿）》。但一般認為「信陽事件」中「信陽地區825萬人非正常死亡八分之一強——約150多萬人」。
- 10 章重，〈信陽事件揭秘〉，《黨史天地》，2004年，第4期。

活動消息



近代中國民族起源話語問題

吉開將人教授（北海道大學）

日期：2012年6月20日
 時間：12:00-1:30pm
 地點：香港科技大學教學大樓3362室
 語言：普通話

查詢
 電話：2358 7778
 電郵：schina@ust.hk 網址：schina.ust.hk

主辦：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卓越學科領域計劃：「中國社會的歷史人類學研究」

綿延與更新

——一個家庭歷史的回顧

曹寧
湖北大學專門史

在河南省東部的豫東平原上有一座年輕而又獨特的城市，這裡在地理上位於黃河與淮河之間，發源於鄭州西南部的賈魯河、源於豫西山區的沙河和淮河的一大支流——潁河在此交匯，因三川彙集，現在叫做川匯區。日久天長，此處因黃淮沖積而成平原，故多受黃河肆虐，歷史上自南宋以降，河水便多次決口，經此地入淮至海，河道既淺又窄，自是氾濫之處一片汪洋，最近一次則在1938年，鄭州花園口決堤，此地便成了著名的黃泛區。然而幾百年來，福禍相依，河水的充沛竟塑造了一座新的城市，那個時候，人們叫它周家口。

水道輻射之地，自然連接了各處的交通，於是豫西、北地方直至山、陝的物產與來自江淮的商品便在此處交易。據史料記載，明洪武初年（1368）潁河北岸形成墟集，名永寧集，永樂初年潁河南岸建子午街，在子午街河邊開闢周家渡口。永樂六年（1408）朝廷開闢淮、潁、沙河漕運，周家口由是逐漸商業繁興。到了明末，熊廷弼過周家口時說「萬家燈火俟江浦，千帆雲集似江皋」。周家口的真正興盛是在清代，康熙年間設周家口鎮，乾隆年間開闢渡口16個，擁有街道116條，常住居民數萬人，流動人口達十數萬。周家口一躍而與當時的朱仙鎮、道口鎮、社旗鎮並稱河南四大商業名鎮，聲名顯赫一時。後來隨着泥沙淤積，河道漸堵，咸豐同治年間又遭擄軍之亂，「三次焚毀，幾至於盡」，城市繁榮從此不再。1906年京漢鐵路開通，大量商民被周家口以西數十公里、地處鐵路沿線的漯河所吸引，紛紛搬遷，周家口碼頭上不再像過去人聲喧嘩、桅檣林立了，只有現在沙河北岸的關帝廟依稀可見當年陝山會館的氣派來。此地以轉運貿易為起點，彙集西北、江南各地商人來往其間，對附近

居民自會造成若干影響。這裡地勢平坦，河流平緩迂直，所生所長仍是以農業為主，至於人物風貌，不似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人性柔和，婉而有約，近於江淮，多與皖省相類。從此地往東南三十多公里到項城，便是當年民國總統袁世凱的家鄉。袁世凱祖父甲三曾官居漕運總督，督辦安徽軍務，袁世凱本人也發跡於淮軍將領吳長慶麾下。

一、置土為家

從當年的周家渡口往北偏東大約十里便是我家所在的村莊，這裡是周家口鎮所轄的邊界了。集市以轉運貿易為主，進行商品往來，然其周邊地區仍是以農業為本，是典型的鄉土社會。我家所在的村莊叫做曹寨，據村莊的碑刻記載，曹姓在清代中葉自淮寧府搬口鄉遷入，人數只有一百多口，初時築有羅漢寨，曹姓居多。當時周家口郊區人煙還比較少，我的曾祖父生於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據說是三代單傳，家裡幾代人省吃儉用，積累下來的錢都用來購置土地，到曾祖父年輕的時候，家裡有十幾畝地和兩頭牲畜。中國農民的土地觀念實是深厚，《江村經濟》中一位村民這樣說：

土地就在那裡擺着，你可以天天見到它，強盜不能把它搶走，竊賊不能把它偷走，人死了地還在。¹

那個年代，大部份中國人都把掙來的錢財用來購置田產留給後代。這樣到了夏秋兩季，家裡自然人手不夠，曾祖父與曾祖母商議，請了兩位遠方的親戚來協助生產，那時候叫長工。秋麥過後，曾祖父就給他們麥子、小米和錢財。地裡的莊稼

大部份種小麥，而高粱、穀子、芝麻、煙草、花生、棉花等經濟作物也會種上一些，自家消費，只是這樣的情況並不長久，最後不得不請同村的人來耕作，也就等於租了出去。後來這種家裡人丁稀少的情況很快發生了改變。曾祖父的第一個妻子很早病逝，這裡還要敘述一段插曲：他們的孩子大約在孩童的時候被一夥土匪綁票了，勒索的錢財很多，家裡拿不出那麼多錢，雖然儘量籌集，最終還是被撕票了。我推想這應該發生在19世紀20年代初，大清國雖是倒台了，但是社會特別是農村社會仍與這個國家的動盪局勢相始終，社會統治秩序更替中的混亂在農村表現得尤為突出。據父親告訴我，那個時候很多家裡都會備上槍枝的，從一般的鳥槍到「漢陽造」不等，但也有先進的手槍。鄰村的一戶人家花了高價買了一把能打連發的駁殼槍，竟然引來了土匪們的關注。土匪們放出話來要在某個晚上來取槍，那天天一黑，果然便聽得咚咚的馬蹄聲直奔主人家來。土匪們到了門口卻見大門緊閉，院子裡靜悄無比，他們想破門而入，門頭上卻突然一聲槍響，土匪們欲從圍牆上爬過，不料，附近又是一聲槍響，好像房前屋後皆有人手，如此往復來回，倒讓土匪們有所畏懼，以為主人家幫手甚多，這樣僵持到了半夜，土匪們終是不敢入內，馬蹄聲便漸漸遠去了。這則故事頗為流傳，主人家一人擊退群匪的情節後來被人廣為傳說，這種看起來像電視劇裡發生的場景，現在講起來也不由得讓我們為這位身手麻利的主人家捏了一把汗。據《周口市志》記載，因此地以北為淮陽縣與周家口鎮分界地帶，地勢多有陡坡，便於隱匿，故而土匪聚集，幫眾甚多。²

後來，曾祖父娶了家住沙河岸邊的吳家女兒，那便是我的曾祖母了，民國十六年（1927）我的爺爺出生了，接着便陸續又有了另外三個爺爺和兩個姑奶。爺爺是他們中的大哥，到了全國解放的時候他只有22歲，他的弟弟妹妹甚至更小，這一時期的重擔就落在了他和曾祖父兩人身上。爺爺是個樸實的農民，話不多，工作起來卻總是不知疲倦；鄉間裡，眾人聊天的時候，他總是更擅於傾聽，不時在他那乾瘦的雙頰上顯露出

笑容，時而劃上一根火柴點上一支煙。他總是不願閒着，爺爺直到年老的時候，還不願意放下他工作了一輩子的農具，直到他真的做不動了。他性格柔和，我幾乎沒有見過他發脾氣，當他有些事看不慣的時候，往往也逆來順受，也許這就是我現在所理解的爺爺，可惜他到2002年的時候已經不在了。關於這一段歷史，我更多的是從二爺爺的口中知道的。這一時期，家裡的土地又有所增加，每年收穫的糧食交上租稅，留下自己吃的，其餘的仍拿去換錢購置土地。中國的農民好像為了獲得土地而上癮了，他們生活簡樸，勤儉持家，不為別的，只為土地，有了土地心裡便踏實。爺爺們的教育是來自與隔壁楊村的一戶人家共請的一位私塾先生，老師第一堂課所教寫的便是「天」、「地」、「人」三字。³既然科舉已歿，再多讀書已無多大用處，況且家裡也無多餘錢應付此項支出，到了四爺爺的時候才有機會去學堂。中國自1906年停科舉、建學堂，即使幾十年間，偏僻遙遠的鄉村也並無多大改觀。民國時期，晏陽初、梁漱溟等人深入農村，施行教育，恐怕也是出此考慮。據《淮陽縣志》記載：民國二十四年（1935）全縣識字人數只佔總人口的7.91%。⁴

鄉村物質貧乏的生活，延續着傳統的農業生產，到了災荒年代，小地主與佃農的生活並無二致。《淮陽縣志》記載，小麥在民國二十六年（1937）平均畝產量僅48公斤，還不到100斤（如今小麥畝產量平均也可達1,000斤），農業歉收，佃農們便想方設法的拖欠田租，而地主們亦無計可施。⁵村裡的老年人曾告訴過我，有一次曾祖父去田裡，遇到一位佃農正在偷割小麥，兩人發生了爭吵，那形勢似乎相當激烈，但曾祖父最終還是讓步了，因為那人實在是長得牛高馬大，再差一點就要動起手來了。農村人最看重自己的莊稼，但凡被偷了去的，往往會採取一些舉動，讓全村人都知曉。村裡人還告訴我，每當一些家庭糧食緊缺，實在挨不過去的時候，他們便會拿着麻袋去找曾祖父，因為曾祖父總是很爽快的接濟他們，可是，當他後來被批鬥的時候，卻沒有人提起這些往事。我今天重新編排這些零碎的故

事，正是我長久以來的願望，對於過去歷史的回顧，總是不易以清晰的結構性的方式去敘述，我們只能從這些隻言片語的事件中去體會那個時代和那個時代的人。家裡還有其他成員，爺爺和大姑奶歲數相近，四爺爺和二姑奶年齡最小，二爺爺、三爺爺居中。據說，他們一輩中，三爺爺最爲優秀，他長得很俊又很會說話，曾祖父每次出去辦事總會帶上三爺爺。可惜三爺爺命運不濟，竟然英年早逝，只留下他的妻子和幾個孩子。大姑奶嫁到城裡，至今仍健在，去年我見到她時，身體很好，還能認得我。我一直想探究一下當年周家口集市對於鄉間社會以及城裡人與鄉下地主之間的互動關係，到現在我還是不甚清楚。我與二爺爺感情最深，我少年時代多承他關心，現在想起，往事如在眼前。他性情溫和，說話比爺爺偏多。他給我說過很多以前的事，我還一一記得。他說日本人當年來到村子的時候，見到小孩就給他們發糖吃，他們許多小孩聚在一起，鬼子嘰哩咕嚕的，聽不懂在說什麼，日本人來的很少，據說只有幾隊人馬就把一個縣城給佔領了。他還告訴我有一位高隊長，是國民黨軍官，在周家口被日本人殺死了，問到名字的時候他則不知道。後來我才知道高隊長叫高志航，是國民黨空軍少將驅逐司令，兼任空軍第四大隊大隊長，駐防周家口，1937年12月22日，在日本侵略軍空襲周家口機場中，壯烈殉國了，死時年僅29歲。周家口此後的情況還是不得不說，1938年，蔣介石炸開了花園口的黃河大堤，河水便向南蔓延開來，周家口就成了有名的黃泛區。離我們村不遠的地方還有一條小河叫黃河故道口，這次洪水的災害使農作物不能生長，河水過後便留下一層厚厚的黃沙，直到1947年決口才被堵上。

二、歲月彌艱

隨着全國的解放，土地改革很快就開始了，家中的土地被沒收，村中三家地多的農戶被劃上了地主成份。父親告訴我，那時的農村是合作社，白天幹活，晚上開會，被劃爲地主的幾家在民兵的看守下天天遊街，開批鬥會，政府搞四清運動，要交出貴重的東西，不老實交待就會受到

更大的批鬥。那時曾祖父身體不好，又加上批鬥，終在1961年4月去世了。由於被劃上地主成份，二爺、四爺的婚姻都成了問題，因此在以後的20年中，曾祖母總是擔心自己的兒子、孫子娶不上媳婦，此事便成了她的一塊心病。爺爺奶奶那時經親戚介紹成了家，奶奶的家在村子北邊二、三十里的地方，他們那裡的人用蘆葦編蓆子掙取少量的金錢。我的父親出生於1961年，作爲家裡的第二個孩子卻與伯父的年齡相差甚大。自1958年「大躍進」以來，人們的生產激情就被毫無限制的放大，在大量看似催人奮進的口號的刺激下，人人渴望「跑步進入社會主義」。在「以鋼爲綱」的指導下，農業生產陷入困境，政策的偏「左」促使了「浮誇風」盛行，爲了應付上級的檢查，農民們手中的糧食大部份被徵收了，這樣一來的一連串舉動加劇了饑荒的發生。在人們的印象中，五八年是一次災難，據一些老年人回憶說，那時候人們即使挨餓，也只能呆在家裡，各個交通路口都有人把守，不准外出，連逃荒的權利都沒有了，此時發生的「信陽事件」，至今聽起來，讓人有拔劍斫地、扼腕歎息之感。母親曾告訴我，她小時候在村旁、田間的溝壑裡，到處都能見到小孩子的屍體，那時候大人都沒得吃，小孩子更是脆弱，但是60年代以後情況略有好轉，人口大幅增加，我的家裡此後又有了兩個姑姑。農業依舊落後，糧食產量很低，生產工具、大牲畜集體所有，農村集體勞動，吃的方面還是很困難，人們只是靠雞下蛋掙幾個零用錢。那時田裡的農作物卻是種類繁多。水稻這種作物每年也都要種，本地本無水田，人們就在河邊營造，紅薯因產量高而得到人們的青睞，生產隊還有蘋果園。人民公社中，人們靠掙工分分得產品，成年人每天得一個，未成年能工作的孩子只能得半個，母親告訴我，她小時候弟妹多，她很努力地幹活取得半個工分，其實工作量並不小。人們的覺悟本來都很高，可總是有懶散的人，而且工作再多，大家一平分也就一樣了，越來越多的人像是在混日子，生活窮苦。家裡地主的成份又總是受人歧視，生產隊分東西，都是在最後才分給地主，分得的又少又不好，這期間奶奶因爲

有病而得不到治療，也病逝了。父親總是回憶說，他小時候總是被人罵做「地主羔子」，只要是集體上的活動，便處處受人歧視，然而小孩子們一起玩時，卻無多區別，他和小夥伴每天晚上到半夜才回家，有時候就住在別人家裡，童年時光總還是多有樂趣。他頭腦靈活，還養起了小兔子，一到週末便拿到城裡去賣，一隻小兔子就能賣三角錢，日子雖苦，卻也能樂在其中。只是讓他倍感失望的是，因為成份不好，他總是不能做他想做的事，他想去當兵，因為是地主成份而被拒絕了，這些事情在他青年時總是給他很大壓力。我寫到這裡的時候，便心感先輩們不但要忍受貧乏的物質生活，在精神上也倍受折磨，這麼一段段苦難的歷程，他們總算過來了，所以這些年他們倍感生活的富足，滿意而知足。

三、綿延更新

改革開放後，地主的成份被取消了，四爺爺和伯父也都成了家，有了兒女，二爺爺因為年紀大了不好成家，就跟着四爺爺一起生活了。1984年，父親和母親結婚，之後更有了我和弟弟，這時候農村的土地已經承包到戶，農村人都卯足了勁，每家每戶都把一年的大部份時間用在田間勞作上。家裡人也每天都在田間地頭工作，翻鬆土壤，清除雜草，農忙時甚至連午飯都在田裡吃，夏秋兩季收穫的時候還要睡在田裡。這樣，每天雞犬之聲相聞，阡陌交通席地而談，起於日出，歸於日暮，重覆的生活正像是祖祖輩輩們的縮影，如此經年累月，看起來與兩千年前的漢代好像並無差異，翻地用的犁子，播種用的耬車，收割用的鐮刀，耕牛與人力，傳統農業的精耕細作又一遍遍的重覆在這片土地上，人們填飽肚子的願望總算得以實現，但現代化的氣息好像離農民還很遠。

人們的生活中，洋火、洋車、洋油這些稱呼還為他們所慣用，人們依舊照着傳統的生活，每天晚上在昏黃的煤油燈下等待着改革春風更深入的吹進。農村大約在90年代以後變化得越來越快，越來越多的農村勞力選擇外出打工，周口市的經濟發展也逐漸帶動了附近的農民，當年的周

家口從淮寧府的一個集市到周家口鎮再到一個專區，一個地級市，走過了它數百年的發展歷程。我小時候每到黃昏便總能見到一個肩扛鐵鍬、包袱，身板硬朗的老漢從城裡回來，人們告訴我，他是在沙河邊上替人裝運沙子的。2000年之後農業的機械化逐漸得以實現，更多的人力被解放出來，國家對農業的政策也較過去有所好轉，當年周家口附近的村莊也都擴展為城市，而本地的農田也變作工廠，新修的公路四通八達，人們的傳統生活正在發生急劇的變化。家裡的收入，農業已經佔很少的一部份，大部份成員外出打工或者在本地工廠上班，而這種收入比農耕所獲得的收入要高上許多，有些家庭已做起小生意，超市、餐館、麵粉店，都超出了以往所有的規模。最近，村前的公路上也形成了集市，每逢初一、十五，各類小販便會很早從各處聚集，排在公路兩旁，綿延數公里，附近村莊的人們也都被吸引而來，選購自己的所需品。越來越多的對外溝通改變了農村封閉的環境，人們從各種各樣的媒介中感知着現代化生活的愉悅，這一值得欣喜的現象背後，也折射出從傳統到現代化轉換的歷史大潮。一些社會現象也隨之改變，一個明顯值得注意的事情便是：現在農村孩子讀大學的比例越來越低了。教育問題在人們還沒有走向富裕之前好像總是一種奢侈品，投資過多而收益甚微，但是我們清楚，中國廣大的農村地區是最需要教育的，中國社會從近代以來都在經歷着「三千年來未有之變局」，中國這艘船駛向何處，最終還要看多數船員的意向。村裡婦女多有信奉基督教者，附近的村子裡還有一所看上去很舊的教堂。它大概能教會人們平息生活中痛苦，相信神會照顧行善的人。在每個禮拜的儀式上，她們唱着感情深沉的聖歌，氣氛濃重而緊張，容易給人造成一種壓抑的感覺，情到深處甚至呼吸困難，聲淚俱下。我的四奶奶便是在禮拜中突發心肌梗塞而去世的，人們以為是神召走了她，我認為正是這種氣氛加劇了她因家庭糾紛而受的心理負擔。然而我發現這種信仰暫時在年輕的婦女中影響不大，她們多數接受過教育，相信現世，只有隨着年齡的增長，她們對基督的信仰才逐漸變得強烈。

我的家庭也只是這些大潮中的一例。父親供我讀書，已是滿足了我的心願，只是對我的這項投資使他回報甚微。他工作辛苦，這幾年來總是抱怨自己的身體不如以前，去年弟弟完婚後，他稍得安慰，今年又有了一個孫女，我才感到父親又年輕起來，高興起來。母親一直是我讀書的堅定支持者，她連自己的名字都認不全，卻拼命供我讀書。她不擅言語但性情柔和，內心倔強而又極善良，她在工廠裡做一些閑散的工作，然後為家裡人打點日常生活。四奶奶去年病故後，多承她照顧瞎眼的二爺爺，此種情境回憶起來，每每眼淚打眶，奔湧欲流。值得一提的是，母親也是一名基督徒，現在算來也有十多年了。我的弟弟已成家，與父母住在一起，今年又有了一個女孩，我們給她取名叫「穀雨」，意思就是盼她像是穀雨時節農作物最需要的春雨，我與弟弟自小感情很好，現在家裡又有了一個新成員，也是打心裡感到高興。

此地有一風俗，便是每逢除夕那天晚上，便會去墳地祭奠已故的父母親戚，無論離此多遠也都會趕回來祭拜，形式大多是燃放數掛鞭炮，燒一些紙錢，有些可能會帶一些肉食、水果之類，晚輩再在墳前（東南方）磕數個頭，然後嘴裡嘀咕說一些祝福的話，此種形式的祭拜已不多見，但父親還會要求我們這樣做。我小時候很怕

鬼，後來長大了也就淡了，之後我總在外地，每次回家，已是夜晚，我總是會路過那條小河，那片墓地，然而內心裡有的都是懷念，都是恭恭敬敬的敬意，我們一代一代的人，總是會站在父輩們的肩上一直往前走的，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即使長大成人，我們的血液裡還流淌着他們的精神，他們的勤勞樸實、堅毅執着，他們的筆路藍縷，披荆斬棘還一點一點根植在我們的身體裡，我們一代一代的就像是埋在土壤裡的種子，發芽、成長、開花、結果，我們不斷更新、綿延。正是在這鄉土社會裡，我生於斯、長於斯，帶着一代一代人的目標與夢想，走在了一條新的路上。

註釋

- ¹ 費孝通著，《江村經濟》（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6）。
- ² 周口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周口市志》（鄭州：中洲古籍出版社，1994）。
- ³ 這是有一次我寫毛筆字時，二爺爺看到告訴我的，他當時還問我「豕」、「彘」是什麼。
- ⁴ 淮陽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淮陽縣志》（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
- ⁵ 淮陽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淮陽縣志》。

台灣外省籍國軍的日常生活與記憶

袁子賢
澳洲昆士蘭大學歷史系

作家白先勇，面對父親白崇禧將軍驟然歸真，肅然起敬的緬懷其身後那樣一個大起大落、轟轟烈烈的時代。

父親的辭世，我最深的感觸，不僅是他個人的亡故，而是一個時代的結束。跟著父親一齊消逝的是他身上承載的沉重而又沉痛之歷史記憶。¹

悲痛的時代記憶，同樣背負在無數個逐漸凋零的外省籍老兵身上。2011年8月22日，袁恒祥老先生的公祭會場，長孫子賢，跪在莊嚴的靈堂前，不卑不亢地朗誦着追思文：

七十二年前的爺爺，十六歲的少年，並不無知，並不懵懂，穿起軍服、扛起比自己還高的槍，代替哥哥上了戰場。一場一場的戰役，在那個動盪的大時代裡，來不及的一聲，再見；人，已經在陌生的台灣了。五十年後，再回去的那塊土、那塊地，陌生的，又像失去了記憶；常常盼念的母親，是長長的墳。²

袁恒祥，外省老兵，生於1926年2月3日，中國湖南省桃源縣。16歲那年，代兄從軍，加入國軍後方勤務司令部，第14總隊，對抗日軍侵略，於鄂西抗日之役，獲戰績而晉升准尉。1945年，於華中戰場與中共軍隊對戰，1948年11月底，隨黃維兵團在雙堆集一役中，被劉伯承七個縱隊所圍，³是役，右手手指負傷殘廢。隔年2月，自俘虜營逃出，至漢口，隨部隊整編加入胡璉兵團，駐防舟山群島。1955年3月20日，與台灣籍的鄭碧霞女士結為連理，生有四子。1959年以陸軍步兵

上尉官階退伍。爾後分別工作於宜蘭縣農會與森林開發處。曾於1989、1990年返鄉尋根。

袁恒祥治喪期間，家人發現三大箱遺物，其中有三本泛黃的日記簿，紀錄1950-1954年，隨軍隊移防金門與台灣的心情寫照與軍中生活，以及一本斑駁的〈徐蚌會戰回憶錄〉，一行行的毛筆字在粗糙的茅草紙上，寫下當時雙堆集戰役中的所見所聞。

袁恒祥肄業於中國湖南的天祿中學，見解不俗、文筆頗佳。日記中，讀者得以從一個低階軍人的視角，瞭解軍中的日常生活、消費娛樂與思鄉情緒，並透過袁恒祥的觀察與遊記，揣摩1950年代的台灣社會氛圍。

一、建設與墾荒的軍中生活

1950年袁恒祥隨軍隊移防到金門，駐守位於大金門西南方的小金門，全島方圓七華里，與廈門接近相距約七、八海里，終日槍砲之聲不絕，可謂前線中的前線。袁恒祥在日記裡提到這裡的民情風俗古樸、注重禮教，但物資貧乏，生活消費極高，譬如說香菸，「當時在台灣關西壹圓錢可以買到的，此地而至於參圓或肆圓。」⁴

胡璉兵團移防金門後，呼應當時「固守金門，待機反攻」的國策，致力於軍事構築工事，並推展民生基礎建設。⁵1950年代初期，軍隊的生活，除了一般出操訓練之外，還必須挖防空洞、建設戰地設備與修築馬路；⁶袁恒祥在1954年提到：

今日回溯自卅九年我們剛來的金門，與今日的金門之相比較，不知要相差多少倍……約八公尺寬，廿華里長的中央公路，還帶洋灰柏油的路面……每個村莊都可通卡車。⁷

由此可見，軍隊之於金門地方建設發展的貢獻。

其次，當軍隊抵達小金門之際，仍是黃土一片。袁恒祥形容當時小金門的農產狀況：

百姓除了種高粱之外，就是種花生。我們連花生之砂土地，都找不到。不過花生倒不缺，我們天天吃花生、炒花生、煮花生、花生燉湯……總是餐餐離不了花生。⁸

軍隊的飲食，全倚賴補給船，有時候船未來，每天連菜也沒有得吃，還得到海邊上去拾螺食，甚至撈海水喝。⁹ 營養匱乏，也造成官兵們痢疾的問題。¹⁰ 因此，部隊也開始計劃從事農業生產，袁恒祥其中一項業務就是種菜：

今天朝會回來，馬上同兩位同學到野外尋找菜秧，回來把菜栽好，澆澆水，值星官的哨音響了，開早餐了，我從菜圃裡跑回來，忙得不亦樂乎。¹¹

軍隊的每日課程，除了出操訓練、軍事與政治教育，還注重歷史、地理的知識，袁恒祥常常抄記着上課的內容。¹² 軍中的業務，有時繁重，但就形式而言，卻又無所似事般的，¹³ 也常讓官兵們對未來的生涯規劃產生極大的焦慮感。¹⁴

二、異鄉風情與思鄉情切

胡璉軍團抵達金門之後，特別重視軍民之間的關係。當時怒潮軍官學校校長柯遠芬曾在精神講話中提到，檢討國共內戰失敗的其中一個原因，就在於部隊內部的腐化，以及貪物的現象：

部隊到某一個地方，雞、鴨、鵝、羊、豬，甚至牛也殺來吃，吃倒不要緊，你得給人家錢才對。¹⁵

又強調軍隊要有新的一套愛民與親民作為。部隊的高階幹部們，也常會叮嚀部屬：「（董連長）我們要注意愛民紀律，不准同年輕的婦女說

話，而且要借物的話，不要開口就笑，像姨子似的。」¹⁶

袁恒祥在日記裡也提到了一段與當地民眾商借桌子辦活動的過程，沒想到老嫗哭哭啼啼的不肯借桌：

我當時因為必須，仍得要借，於是我想我們的口號是愛民第一。當時我給她講一番不少的好話……最後才把桌子借出來，還給她寫了一個票據，現在真是民主了。¹⁷

軍民關係慢慢密切、互動開始頻繁，這些從異鄉來的士兵們也漸漸的順應時代潮流，瞭解當地的民情風俗：

今天有幾家老百姓給我送些清明節的東西來吃，亦就是他們準備過節所做的糕……這些東西都很可口，不過當地民俗……只要是給你送來了，你就得接受下來。¹⁸

當地民眾、僑胞都常來軍隊參與勞軍活動。其中，最受軍隊歡迎的莫過於「高山青、澗水藍，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啊，這個高山族群歌舞兒。」¹⁹

異鄉終究不是家鄉，在愁悶與窮苦的軍隊生涯裡，特別容易想家，「中午又看到海裡拉起來一個死屍，是第四連的汕頭人，是開小差想家鄉的。」²⁰ 此外，軍隊中頻繁的自殺現象，也開始受到重視。²¹ 或許是讓這些外省士兵們有所慰藉，當時的勞軍活動，大部份是京劇，像是：鐵公記、穆桂英破天門²²、花田錯、斬經堂²³、捉放曹²⁴，最有名的演員是顧正秋²⁵，來金門巡演時，部隊還會特別宣傳。這些演員的背景也來自於中國各省，士兵們常常聽着熟悉的鄉親話，感覺像是回了家一次。²⁶

除了京劇，團部還會放電影：

影片是叫《翠翠》，內容完全是大陸上

江南的寫鏡，尤其是演出了我故鄉的風味，例如元月十五日玩獅子，五月端陽划龍船……等都是與我們家裡一樣。²⁷

思鄉的人有說不出的苦，往往在重要的節日與日子裡特別想家，回想家鄉裡的一切。袁恒祥在他28歲的生日，特別想母親，也描述家鄉的尊親習俗：

在我家的鄰縣，往往到了八月十五日的前後之夜，有很多給母親還願到古牛大山出燒拜香的姑娘們，她們為母親的患病，敬神的心切，希望母親的病好，手領香燈，三步一拜，五步一跪的，口裡還喊著：一拜天上星、二拜星和月、三拜養兒不知娘心苦。四拜養女不知父母恩。

袁恒祥感嘆着，不知能否再見母親一面，最後決定絕食一天，聊表對父母的養育之恩。²⁸

三、物欲與性欲

軍人的收入普遍偏低，且發薪餉的時間也不固定，1950年代初期，身為步兵上尉的袁恒祥月收入只有130元，但最後拿到手上的也只剩80多塊，逛街時唯一的消遣便是買一張5元的愛國獎券，做做發財夢，或者買一些新奇的軟糖。²⁹ 窮歸窮，袁恒祥仍熱衷於時下流行的鋼筆與手錶，也會托人從台灣帶來最新的款式：

近來聽說台灣的新式游泳手錶很濶、51行的派克鋼筆亦很濶，這兩件東西我現在很需要……我想老大哥住基隆市，一定很便利……兩樣東西在兩百至兩

百五十元新台幣之內來活動，派克筆不行的話，頭號金星的也可以。³⁰

軍人們對這類西化的物品，除了想要嘗鮮，有時候更是一種新潮與時髦的體現。³¹

經濟的困頓與寂寞的環境，引起這些士兵們結婚的念頭，³² 但礙於婚姻法的約束³³，以及當時的台灣風俗³⁴；多數的士兵們對婚姻與未來都抱持消極的態度。是以，精力旺盛的年輕軍人，常常到「軍樂園」去發洩性慾的問題。

我聽講，軍樂園的姑娘很少，只有廿、卅人，應付這全島的部隊，規定是每天四次，每次是一小時，價格很低廉，官長三十元台幣、士兵十五元，先購票，然後檢查身體及體格後方准行。³⁵

縱然，在性慾上有所慰藉，但仍未能填補心底深處之空虛：

我的心呢？硬然是好像有針刺著了，人到了廿七，憑空一身又添了幾根鬢，窗外菜花黃，為我苦淒淒，知心親朋無一字，誰知臥室淚滿移。³⁶

四、日記反映歷史、日常性與意識形態的流動

美國學者Henrietta Harrison在*The Man Awakened from Dreams*³⁷以清朝末期舉人劉大鵬撰寫的《退想齋日記》為文本，讓個人與大時代的變遷進行對話，透過日記中的材料，加以考證，進而描繪清末、民初的時代精神與面貌。而在袁恒祥書寫的日記中，則包括了軍隊的日常生活、娛樂活動、思鄉情緒、民間見聞與消費支出等範疇，資料繁多且豐富，有助於史家重新詮釋戰爭前後的記憶、文化與社會。

註釋

¹ 白先勇，《父親與民國——白崇禧將軍身影集·下冊（台灣歲月）》（台北市：時報文化，2012），頁148。

² 袁子賢，〈濱海路319號〉（宜蘭縣，2011年8月22日，袁恒祥喪禮公祭。）

- 3 郝柏村，〈郝柏村解讀蔣公日記一九四五-一九四九〉（台北市：天下文化，2011），頁386。
- 4 取自1950年6月18日《袁恒祥日記》。
- 5 翁文贊，〈胡璉與金門之研究〉（台北市：銘傳大學碩士論文，2002。）
- 6 整理1950、1951年《袁恒祥日記》。
- 7 取自1954年4月25日《袁恒祥日記》。
- 8 取自1950年6月28日《袁恒祥日記》，袁恒祥於日後加入註解。
- 9 取自1950年7月14日《袁恒祥日記》。
- 10 取自1950年7月26日《袁恒祥日記》。
- 11 取自1951年2月2日《袁恒祥日記》。
- 12 取自1950年6月26日《袁恒祥日記》。
- 13 取自1951年8月12日《袁恒祥日記》。
- 14 取自1952年5月7日《袁恒祥日記》。
- 15 取自1951年1月8日《袁恒祥日記》。
- 16 取自1950年4月21日《袁恒祥日記》。
- 17 取自1950年5月4日《袁恒祥日記》。
- 18 取自1952年4月1日《袁恒祥日記》。
- 19 取自1951年7月27日好友袁耀湘來信。參考1950年5月9日《袁恒祥日記》，記述原住民毛信孝與其兩位公主的表演。
- 20 取自1950年7月10日《袁恒祥日記》。
- 21 參考1951年5月9日《袁恒祥日記》，司令官講話。
- 22 參考1952年6月6日《袁恒祥日記》。
- 23 參考1950年1月26日《袁恒祥日記》。
- 24 參考1951年1月22日《袁恒祥日記》。
- 25 參考1951年2月18日《袁恒祥日記》。
- 26 參考1954年3月21日《袁恒祥日記》。
- 27 參考1954年2月22日《袁恒祥日記》。
- 28 取自1954年3月27日《袁恒祥日記》。
- 29 參考1954年4月8日《袁恒祥日記》。
- 30 取自1950年9月10日《袁恒祥日記》。
- 31 參考1951年4月21日《袁恒祥日記》。
- 32 參考1952年12月4日《袁恒祥日記》。
- 33 參考1953年11月10日《袁恒祥日記》。
- 34 參考1951年8月23日《袁恒祥日記》，袁耀湘來信，提及：「台灣的風俗，金錢是寶貴的，試問每月七十八，哪裡還能做這個（愛情）幻想呢！」
- 35 取自1951年11月23日《袁恒祥日記》。
- 36 取自1953年3月2日《袁恒祥日記》。
- 37 Harrison, Henrietta, *The Man Awakened from Dreams: One Man's Life in A North China Village, 1857-1942*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我家在香港的小歷史

黃永豪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筆者一直相信歷史研究不單是為公侯將相寫傳記，也不單是要為皇朝統治下註腳。筆者相信，如果我們站在研究人的生活 and 人的價值的角度，則每個人、每個家庭，以至每一村落的歷史其實與公侯將相、強宗大族，以至皇朝的歷史同樣重要。每個人的生命點滴、每條村落的歷史片段，可以匯聚成歷史的大圖像。筆者希望撰寫自己家庭的小歷史，為口述研究添上一小塊。回顧自己家庭的小歷史，發覺與近代中國歷史的一個個熟悉的名詞皆可以扯上關係，自己其實是歷史洪流中的一小塊。這篇文章主要是圍繞兒時的生活、與新界侯族的關係，以及父親的抗戰經歷三方面。

一、唐樓與殯儀館

本人是在1950年代後期某月某日正午在香港灣仔灣仔道一座「唐樓」的家中出世。當母親感到陣痛，慌忙召喚救護車之時，我已經急不及待的跑到這個世界。我的二哥替我命名，他記得銅鑼灣有一家戲院名為豪華戲院¹，於是我的名字中有一「豪」字。我不知道為甚麼二哥對這所戲院印象深刻，可以肯定我家的經濟情況不可能讓他有機會到這所戲院看電影。從我的命名可以知道我家並不是甚麼書香世代。

我們一直以為共有兄弟姊妹九人，首四位是兄長，第五是姊姊，自己排行第六。直至數年前安排母親的葬禮，須要填寫所有子孫的名字，父親才告訴我們在九兄弟姊妹之前，還有一位早逝的大姊，名字為「蘇蝦」。我不明白為甚麼父母親在這之前一直說我家有九兄弟姊妹，但是，那一刻我們不敢追問。我們以往一直認為由於母親產下的首四位孩子皆是男孩，故對五姊寵愛有加，她可謂「要風得風」，各兄弟姊妹中只有她不用穿兄姊的舊衣裳，所以我們給她取的花名是

「女王」，現在我們才知道這是另有原因。

對於兒時在灣仔的生活，印象已十分模糊，只記得每天站在街上看香港殯儀館的舉殯過程。香港殯儀館²就在我家的附近，經濟環境稍好的家庭舉殯時，會有銀樂隊作前導。自己少不更事，每天看着銀樂隊在吹奏，滿以為是很好看的表演。

我對唐樓的生活一無所知。香港的唐樓指三至六層高樓宇，沒有升降機，只以木樓梯連接各層。唐樓生活最困擾人的，是夜深人靜時，人們穿着木屐踏在木樓梯上所發出的巨響。母親說當時仍有收「夜香」的，收「夜香」的往往是把糞桶沿木樓梯拖到地下，所發出的巨響頗嚇人的。現時我們由於懷念以往的生活，無論傳媒或人們的記述皆或多或少美化了唐樓生活的實況。

我出生之時，家庭的環境算是可以的，眾兄弟姊妹中只有五姊有兒時的照片，是她約在一歲時在維多利亞公園³拍攝的。自我出生後，家中的經濟環境每況愈下。大約在三、四歲時，唐樓須要拆卸，父母的經濟情況沒有能力在香港島租住樓宇，在沒有任何辦法下，舉家搬往新界。

二、與侯族的淵源

新居是一所木建的單層小木屋，面積約有兩百平方呎，位於新界上水金錢村後一個山丘的山腰。這是政府土地，俗稱「官地」，在五、六十年代，人們在政府土地上偷偷蓋搭房屋居住是頗普遍的。這個地方是由父親的一位陳姓好友找到的，所有建築費用也是他墊支的。搬進去時，我家有祖父、父母和兄弟姊妹共八人，我的么妹是在搬進後才出生的，只有她才是道地的「新界人」。

這裡雖是政府土地，卻是新界金錢村侯族⁴

的墳山，是埋葬金錢村侯族先人的地方。在我家的右鄰約50呎外有一所小屋，住了一對年老的夫婦，遠處有一所農場。我家所在的地方舉目所見皆是墳墓，數目約有數十個。大致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一些長約6呎、闊約4呎的土丘，土丘前會豎立一塊土磚，從土丘的高度大致可以估計這土墳的年月，年月越久的其土丘的高度便越低，有一些土丘的高度只有兩、三吋；第二類是一些「金塔」，人們把先人埋葬在土墳若干年後，會把先人的骸骨起出，以坐姿移放在一個瓦罐中，稱之為「金塔」，金塔大多是露天的，沒有建築物遮蓋，人們不會在金塔前豎立石碑，金塔有些是單獨一個，有些是兩、三個並排在一起的；第三類是把金塔放在一具規模的土磚或土敏土建築內，稱為山墳，面積細小的也有十多平方呎，墳墓會有刻上祖先名諱的石碑。土丘並不是一定會改成金塔或山墳，有一些土丘一直並沒有人拜祭。隨着歲月的流逝，一些金塔內存放的骸骨會風化消失。我家周圍皆有土丘、金塔和山墳，門前梯級旁邊就有一個金塔，某次兄長在踢足球時，曾經弄破了這個金塔的瓦蓋，本人並沒有看過內裡乾坤，兄長說內裡沒有東西，父親後來買了一個新瓦蓋把金塔蓋好。

搬進去後，麻煩事便來了。我家的左鄰不足4呎是一所山墳，也是我家麻煩的起源。原來香港政府有一條法例，規定在山墳周邊10呎內不能有建築物，當這山墳的金錢侯族後人知道我們在這裡建了房屋，便馬上要求香港政府下令我們遷出。當時俗稱「寮仔部」的寮屋管制組（負責執行清拆新界地區僭建物的部門）頗落力執行此項工作，幾乎每星期皆到我家，限令我們搬遷。他們總是人未到、聲先聞，先是幾句響亮的「問候聲」，然後是警告，當然其態度不會是友善的。在不勝其擾下，祖父曾經拿起鐵鋸，企圖衝出去與「寮仔部」的職員拼命，他說：「坐監好過罰街。」當時家裡的經濟情況的確已無法負擔再搬遷的費用。

就在走投無路之時，某天，父親在上水石湖墟⁵ 徬徨無助之時，突然有一個人叫他：「阿俊！點解失魂落魄呀？」他是上水廖族的一位鄉紳，我不知道他們是如何認識的，但他們的對話，顯

示他們交情深厚。父親告知他我們所面對的困境，不知何故，事情自此出現轉機，父親沒有告訴我當中的來龍去脈，只知道自此「寮仔部」的職員再沒有「探訪」我們。後來，我家獲香港政府發給一張臨時寮屋證，「暫時」容許我們在官地僭建「暫住」。父親很重視這張證件，放在一個鐵盒中好好保存，曾經拿出來讓我看過一、兩次，叮囑我要小心保管這證件，他說：「沒有這張證件，我們便要罰街。」證件內文大意是香港政府暫時容許我們在官地上蓋搭僭建物居住，香港政府可以隨時收回土地，屆時我們便要自行拆卸和搬遷，不能留下一磚一木。後來我才知道，自此，每年春節的年初四或年初五下午，父親皆會獨自一人，拿着家裡一隻最肥美的雞隻向這位廖先生拜年，一直到這位廖先生在80年代去世才停止。

每年重陽節前（侯族只在重陽節掃墓），父親會把屋旁的山墳打掃乾淨，有一、兩年更為山墳石碑的碑文重新塗上紅漆。幾年後，拜祭這山墳的侯族後人對我們的態度開始轉變，每次拜祭後會把祭品中的水果從窗外送給我們，並多謝我們把山墳打掃得如此清潔。一個從屬的關係從這些小節中建構出來，現在有點懷疑他們視我家為看墳人。

在60年代，金錢村侯族仍有打更制度。有時在夜深人靜、順風之時，在家可以聽到打更的聲音。雖然我家對金錢村的更夫「只聞其聲，不見其人」，但是，金錢村視我家所在是他們所管理的地區，每年農曆年底，金錢村會有人到我家收取打更費。大約到了60年代後期，金錢村才廢除打更制度。雖然侯族視我家所在是其管理範圍，但一直不曾管理這地方。

我家與侯族的另一個緊密關係是教育。我家各兄弟中，從二哥到八妹皆在金錢村何東學校讀書，只有么妹就讀松柏塢村⁶ 博文學校（建於1962年）。我們一直不知道原因，在數年前某天，與母親談及此事，母親才告訴我，當年她帶么妹到金錢村何東學校入學面試時，負責面試的老師問了一個「莫名其妙」的問題：「你的家裡是否養了很多雞？」母親明白他的意思是要求禮物，於

是帶了么妹到松柏塢村博文學校面試。

金錢村何東學校位於金錢村村前，前身爲「宗福學校」，附設於金錢村宗福神廳旁。金錢村侯族在1955年得到何東爵士（1862-1956）⁷的贊助，在金錢村村前建立校舍，更名為「金錢村何東學校」，校董會成員由金錢村侯族父老組成。⁸雖然金錢村何東學校可算是金錢村的村校，但是，由於受到政府的資助，也有收錄外界的學生，最讓我們感受到其爲侯族村校的是每年重陽節的侯族祭祖。侯族與廖族皆是新界的大族，但兩族關係並不良好。廖族的太公山墳（廖仲傑衣冠塚）位於金錢村村後的小山丘，而侯族的太公山墳則於上水廖族的所屬地區，每年重陽節祭祖是兩族的頭等大事，廖族和侯族皆藉此事各自向對方展示實力。上水鳳溪學校的學生（鳳溪學校與廖族的關係等如金錢村何東學校與侯族的關係一樣）會在銀樂隊的帶領下，浩浩蕩蕩，步操經過金錢村旁前往其太公祖墳，而廖族的族人跟隨在後面。而翌日，金錢村何東小學的學生也會在銀樂隊帶領下，陣容鼎盛，步操經過上水廖族村旁，前往太公祖墳拜祭，而侯族族人跟在學生的隊伍之後。爲了此事，每年金錢村何東學校的學生需花三、四星期時間練習步操。銀樂隊穿着制服，樂器有大鼓、小鼓和長喇叭。我們雖不是侯族的後人，也須參與步操，也須向侯族祖墳拜祭，之後會在野外「吃山頭」，即是吃盆菜，每個學生獲派一對筷子和一個飯碗，約十多位學生分得一個盆菜，蹲在山頭來分享。那個時候並不覺得吃盆菜是具有甚麼深厚文化的活動，只覺得是有點簡單而味道不錯的食物。由於從金錢村步操往上水，沿路需由警方護送，隊伍佔了一條行車線，不知道是否由於對沿路的交通影響頗大，這項步操活動在我參加了兩次後便沒有再舉辦。

金錢村侯族每年農曆正月二十日皆舉行福德神誕，神誕期間在宗福神廳旁邊會有神功戲表演，我家甚少到金錢村看戲，原因可能是由於場地細小，只有戲台而沒有戲棚，村民在戲台前的空地上放置椅子看戲，我們外人不可能坐村民的椅子，站着看戲便顯得格格不入。

金錢村後山是金錢村族人舉殯的地方，我並

不瞭解侯族舉殯的儀式內容，但每次見到在這後山蓋搭起殯儀帳篷，便知道當晚金錢村侯族人會在這裡「守夜」，翌日出殯。金錢村後山附近甚少民居，十分僻靜。這裡有一馬路通往金錢村香港賽馬會雙魚河會所的正門，途中會經過廖族的太公山墳。廖族的太公山墳位於山腰，而山頂則有荒廢的戰壕，不知道是否英軍曾在此地操練，但是此地是本人讀小學之時其中一處常常遊玩的地方。

三、古洞與上水

在這一節，筆者想談談我們與古洞墟與上水石湖墟的關係。從我家門前的小泥路走五分鐘便是一道馬路，從這馬路大約步行十分鐘便到青山公路，往西走五分鐘便是古洞墟，往東沿公路步行大約三十分鐘便是石湖墟。兒時人們不會沿着公路步行前往石湖墟，而是經由燕崗村、松柏塢和菜園村的阡陌前往石湖墟，大約步行二十分鐘便可到達。

石湖墟是北區最大的墟市，有戲院、客棧、金鋪、柴鋪、菜市場、木廠、加油站和茶樓。此處也是北區與其他地區的交通交匯處，其旁是上水火車站。其北面便是邊境的羅湖，在五、六十年代，由於韓戰禁運的影響，此地是走私客聚集的地方，頗爲繁盛。

石湖墟讓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之一是警方的防暴演習。上水石湖墟市中心內有一所大江國貨公司，⁹國貨公司與中國大陸的緊密關係，在香港是人所共知之事，1967的「左派」暴動後，香港警方時常在大江國貨公司門前的街道舉行全副武裝的防暴演習，看見警員戴着防毒面具，感覺十分恐怖。到了年紀大一點，才明白爲甚麼警方要在國貨公司門前舉行防暴演習。

由於在青山公路行走的公共巴士班次甚爲疏落，大約是每半小時至一小時一班，兒時甚少到石湖墟，一年或有三數次，大多是步行前往。記得某年的春節後，與胞弟一起前往石湖墟購買戰車模型，我們選擇了很久，終於找到一份最廉價、價錢剛好是我們全部的「利是錢」的模型，待店鋪老闆在架上拿下這模型時，我才想起剛才

貪一時之便，花了金錢乘坐公共巴士到石湖墟，現在欠兩、三角錢，情急之下，馬上拉着胞弟轉身逃跑。

雖然上水石湖墟貨物選擇最多，但是，由於交通不便，我們大多是前往古洞墟購物。這是一個位於青山公路旁邊的小墟市，大約只有二十多間店鋪，有茶樓、五金店、粥店、雜貨鋪、豬肉檔及菜鋪等，日常用品都可以在這裡買到，大部份的店鋪皆是上午營業，除了一、兩所士多外，其餘大多在下午休息。在這裡購物，可以跟相熟的商店賒數，到年終才結帳。

古洞墟在每年的農曆正月舉辦神功戲，日子是在侯族的福德神誕之前的數天。母親每年皆會帶我們到古洞墟看戲，晚上觀看粵劇的觀眾往往是「人山人海」，必須有戲票才可以進入戲棚看戲，但是日間的觀眾較少，更沒有人看守門口，我們就可以進入戲棚看粵劇。我雖然「看」了這麼多年，但從來不知道每齣戲的內容，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老倌的「爆肚」、在粵劇表演中加插的賣武和賣葯表演，當然還有戲棚外的甘蔗檔。

四、兒時的生活

由於我家附近沒有民居，門前小泥路就是我們的遊樂場，由於沒有其他小朋友一同遊戲，這樣反而讓我們各兄弟姊妹關係十分良好，感情融洽，由於沒有受到當地孩子的「教導」，所以我們這些「新界仔」對於鄉村孩童的各種玩意一概不懂。

兒時家庭經濟情況十分拮据。很多時候晚餐是一兩粒腐乳、鹹魚和一些青菜。有時母親會採摘馬屎莧（野生的莧菜）來作菜。我們也吃過母親用竹葉煮的糖水。成長的竹葉是有毒的，但是，剛長出來、仍是針狀的竹草是可以食用的。我們也時常吃「麵包邊」。士多或店鋪售賣「多士」之時，為求美觀，會把方包的邊皮去掉，我們稱為「麵包邊」。母親把這「麵包邊」買回來，有時作為早餐，有時煮成糖水。

當然我們眾兄弟姊妹並不會滿足於每天只有三餐，於是廚房內的沙糖、蝦米或者是豬油便是我們偷食的主要目標，兄弟姊妹眾多的缺點是只

要一人一口，也很快便露出馬腳，但好處是母親不知道打罵那一個。

印象最深刻的是吃南瓜。在搬進新界的最初數年，由於交通不便，父親留在港島打工，每隔數天或一星期便會買米回來。記得搬進新界的第一或第二年，颱風「溫黛」¹⁰吹襲香港，死傷甚眾，位於九龍與上水之間的沙田全區被水淹，新界與九龍交通中斷，父親無法買米回來，當時米缸無米，家中無餸菜，母親見門前有一個半熟的南瓜，於是便把南瓜煮熟來作晚餐，一家十口（祖父、母親、八兄弟姊妹，當時么妹仍未出世）就以這個南瓜作晚餐。「記否當年吃南瓜的日子」成為我們罵家人忘本和不節儉時的語句，有十多年時間，我家一直再沒有吃南瓜。

兒時的生活是頗刻苦的，斫柴、打水和燒開水等各樣工作皆由我們這些「化骨龍」負責。最初我們是跑到由一個洋人家庭所經營的農場打水，農場的規模頗大，一半用作居住的地方，有一所兩層高的西式別墅，居所的外圍建有十多個高約3米的大鐵籠，養了不少雀鳥，另一半則用作養豬和牛，建有一個水井，我們就是在這個水井取水。大約兩、三年後，這農場生意失敗，洋人舉家離開。西式別墅成為我們的「探險樂園」。仍記得其屋前的兩大片黃色的石塊，很潤滑和清涼的。

由於家境窮困，兄長很早便輟學，投身工作，幫補家計。據母親數年前在一次閒談中告訴我，大哥入讀赤柱航海學校¹¹，畢業後獲派往一艘在瑞典註冊的貨船上工作，一去就是三年。某天，母親看見門前的竹籬笆外有一黑黑瘦瘦的青年在東張西望，感到十分奇怪，再三細看，才發覺這是離家三年的兒子。

在60年代，無論是平常日子或節日，均沒有親戚來探訪我們。親戚不來我家拜年，除了是交通不便外，相信與各人的經濟不佳也有些微關係。我們九兄弟姊妹，每人兩封利是，花費不少。仍記得每年的農曆新年，只有一位住在香港的老伯會到我家拜年。他皆是在年初二早上從香港島出發，到了我家已是下午，吃過晚飯後，他會在我家的廳中睡覺，翌日早上才回香港。現時

他晚上在廳中睡覺時的咳嗽聲仍然歷歷在耳。現時的香港人很難想像新年拜年要花兩天的時間。

雖然我家位處邊遠地區，但是在60年代中期，每年冬天，親朋會在某天到我家聚餐，為的是吃狗肉。我家一直有飼養犬隻來看守家門。不知道是父親的主意，還是親朋的要求，每年天氣最寒冷的某一天，父親會殺一隻狗，大宴親朋。狗是有靈性的，無論在平常日子與牠們怎樣相處，在準備殺狗之時，即使手上沒有任何東西，只要動了殺心，狗是會知道的，會四處躲避。殺狗是一件十分殘忍之事，斧斫、上吊、水淹等方法皆有使用過。殺狗後是剃毛、斬件和煮熟，要花四、五小時以上的功夫。數年後，在母親的反對下，父親不再舉行屠狗大會。平生只吃了兩次狗肉，以後我不願再吃。在田野考察時，老師教我們須放下身段，桌上有甚麼都要接受。我對海鮮會產生皮膚敏感，人們給我蝦蟹，我會毫不猶疑進食，但是，若是狗肉，我無法接受。

現代的香港人很難想象沒有電力供應的生活。約在1968年以前，我家是沒有電力供應的，電力公司表示若要供應電力到我家，須豎立十多條電燈柱，由於只有我們一家，所以，須由我家負擔所有的費用，每一條燈柱費用為五百多元，對於我家來說是一個天文數字。

在70年代以前，我家是沒有食水供應的。每天要打水回來食用。洗澡成了一件大事，在夏天，我們並不是每天洗澡的。在冬天，洗澡更是令人頭痛的事。首先需煮沸一大鍋熱水，然後取用五六分之一熱水，加進冷水來洗澡，洗完的水不能倒掉，這是下一位洗澡者的第一盆水。

60年代後期，開始有居民遷入，在我家附近建屋居住。建屋的位置其實是被「鬼」規劃的，即在土丘與金塔之間的空隙建屋。人口增多，「鬼」也只好離開。一些土丘逐漸沒有親人拜祭，慢慢湮沒，有些則被遷葬，一些金塔則由後人移走。移走金塔是十分容易之事，先進行簡單的拜祭儀式，然後把金塔放進竹籬中，再用擔子擔走。

大約到了1969年至1971年左右，由於遷入的人口逐漸增加，各個家庭分擔了建造燈柱的費

用，再加上嘉道理農場的資助，我們終於有電力供應。亦由於有電力供應，一、兩年後，各家各戶經過連串商討後，合資在馬路的河邊建造一座水泵，把河水抽上我家屋後的小山崗上用水泥建造的水池，再以水管把河水輸送到各家各戶，我們終於有「自來水」的供應。有份參與建造這供水系統的家庭，每年須繳付會費，以支付供水系統的費用和每月的電費，此外，每年輪值，由一家負責管理這供水系統和會費。年底開會，宣佈財政收支，並把管理工作交予輪值的下一家。此時，亦會把一部份的會費開投，稱為「標會」，讓需要資金周轉者投標，息高者得，所收取的利息作為補助維修及電費開支，雖名為「投標」，其實很多時下標者早已告知其他家庭，自己急須金錢周轉，其他家庭大多會「讓路」，放棄投標。這個供水系統形成了我們村落的認同和界線，有份的戶口便被視為同村人。及後，雖然在70年代後期或80年代初香港政府改善了供水系統，我家所在的地方開始有食水供應，各村民逐漸退出這供水系統，但是，我們仍以這供水系統作為我們村落的認同和區域界線。

在70年代中期以前，本村並沒有市政服務。村中各家習慣把垃圾堆放在村前的一塊空地。祖父每天早上5時便起床，大約在6時前便已經到達古洞墟的茶樓飲早茶，很多時伙計仍未上班，他會自己開茶，跑進廚房取點心，大約7時便回來，打掃地方，清除野草，然後是燃燒垃圾。祖父在1970年逝世後，這項工作便由父親和我們各兄弟負責。

隨着政府管治效率增加，村中的鄰里關係則日漸疏離。在未有電力供應之時，向鄰居借用日常生活用品是十分普遍的，家家戶戶離家時往往只把大門虛掩。但當有了電力、電話和食水等供應後，鄰居的往來其實是減少了。有了電視後，人際關係更加疏離，晚飯後，各家各戶皆留在家中看電視節目。

五、祖父與父親的歷史

父母親從沒有「告訴」我們待人接物的態度，他們是「身教」而不是「言教」。印象最深

刻的是被父親「騙」了讀書。父親每天早上總會買一份報章，無論是在茶樓或在家中，皆花上半小時以上，每頁每頁的仔細地「看」。兒童總是會模仿長輩的動作，以為報紙中有甚麼好的東西，於是我也時常拿起報紙閱讀，慢慢培養出閱讀的興趣，對文字着迷。在每星期的星期三，香港政府皆會派出一輛流動圖書車到金錢村村口為村民服務，這流動圖書車成為我兒時的主要知識來源。在小學時，教中文科的馮老師家境雖然不好（據說曾任國民政府的某廳長），但每屆學期結束之時，皆送一本書給我，以作獎勵，我的中文就是這樣日漸進步。數年前與母親談天，母親告訴我父親其實從沒有上學，不懂字的，只是每天在看報紙的圖片。現才明白為甚麼父親簽署時皆一筆一劃，十分小心地「書寫」，其實他只是在畫圖畫。本人之所以被父親「騙」了，是父親很喜歡穿着襯衫，口袋常常插着一枝墨水筆，父親一直努力擺脫不識字的困擾。

本人對研究歷史的興趣，也是源自父親。在60年代後期和70年代初期，父親每天晚飯後，總會在門前乘涼，與鄰居談天，自己總是坐在旁聽聆聽。但是，自從家中有了電視後，父親的故事再比不上「青蜂俠」和「歡樂今宵」那麼吸引了。父親所談的大多是抗戰「走難」的情況。現在才明白，原來父親生命中最精彩的時間便是「走難」的日子。

我的故鄉是台山。在數年前曾跟隨父親回故鄉掃墓，故居已經倒塌，故居位處村後山邊，環境十分陰暗和偏僻，相信我家在村中並不是甚麼有地位或富裕的家庭。當地的大族是雷、鄭和伍姓，我家的姓氏在當地是小數人的姓氏，而從祖父曾被「賣豬仔」，相信家境一定不好的。

祖父的職業的木工師傅，年青時曾被「賣豬仔」到東亞南當勞工，並在當地結婚，生下大伯及父親。父親一直相信祖父所到的地方為泰國。但是，四哥記得父親曾談及祖母遺下包裹頭髮的頭紗，包裹頭髮是回教女性的習慣，泰國婦女是不會包裹頭髮的。在清末民初，台山會有很多居民被「賣豬仔」到印尼，一些地區仍然保留印尼的風俗。祖父每天午飯後躺臥在床上，反覆哼唱

同一歌曲，第一句的音調是這樣的：「maloma，malomaloma」。四哥是在泰國工作的，他告訴我泰國的語言並沒有這個音調。一位朋友告訴我，「malo」一詞在印尼話是羞耻的意思，因此，我相信祖父是到印尼當勞工，而不是在泰國。

據父親說祖父是與當地一個皇族的女兒結婚，這點我相信是真的。當生下大伯和父親後，祖父騙祖母說要回鄉探親，於是帶同祖母和兩個兒子回到台山定居。據親戚說，他們當時目睹祖父是帶着一箱金條回台山的。祖母的家庭曾多次寫信到台山追查女兒的下落，祖父總是不回信。這事是我對祖父印象不佳的一個原因。

由於經濟富裕，祖父回到台山後很快便染上鴉片烟癮，對祖母的態度轉差，稍不如意，便「一張凳車過去」（父親的用語）。祖母到了台山數年後便逝世。祖母逝世時父親只有12歲，在田間工作接訊趕到家門，祖母已經離開人世，只能跪進家門。

祖母逝世後，祖父的經濟變得十分拮据，於是把兒女一個一個賣掉。父親本來也被賣掉，祖父已經收了訂金，但當買主到家時，父親經歷所有兄弟姊妹離家後皆一去不返，早已知道是甚麼回事，絕不肯離開家門，結果買主放棄，取回訂金。

所以，父親的兄弟姊妹的姓氏皆不相同的。在六、七十年代，父親的胞弟（已改姓張）寄居在灣仔父親的建築公司。每天在外做臨時工，晚上回到建築公司後，總是飲得爛醉如泥，胡言亂語，我們稱呼他為「醉猫昌」，我們對這位叔叔的印象十分不好，最後他被父親趕走了。當時年少無知，很討厭這位叔叔，現在回想起來，反而很同情他，父親曾說當養父母的家庭無兒無女時當然會視養子如珠如寶，但生下親生骨肉後，養子便賤如泥。面對這樣的人生，叔叔若不以酒麻醉自己，還可以怎樣？

上文提及的建築公司是父親的一位長輩邀請他一同經營的，這長輩出錢，父親出力，由父親經營，並且給予百分之五十的股本。公司中有一位父親的好友，是「道友」（吸食鴉片），每年總會有兩、三次會對我父親說：「過兩天又要返鄉下

了」。所謂「返鄉下」即是入獄，警方要向上級呈交業績時，就會控告他吸毒，被判入獄數星期或一、兩個月，出獄後便回來工作。到了80年代，他終於真的回鄉下了，告訴父親他年事已高，無法工作，要回鄉下定居，父親給了他一筆退休金。

父親15歲時，約在1936年至1937年，與祖父一同到香港謀生。自此一直到80年代都沒有踏足故鄉。我知道香港淪陷時，父親、大伯和祖父都在香港。父親說，日軍進入香港島時，有很多人四出搶掠，祖父也跟隨別人四出搶掠，由於值錢的東西已被早前的人搶掠一空，結果搶了一個電話回來，被父親罵了一頓。

香港日治前期，父親仍在香港。他在一所酒樓工作。有一位日本軍官每天晚上皆到酒樓飲酒，他會把所配戴的軍刀和手槍交給父親掛在牆壁，離開之時，父親會把軍刀和手槍交還給他。我不知他為甚麼這麼信任父親，可能他已經不在乎自己的生命。他曾對父親說：「你比我好，你可以回家，我沒有機會再回家了，今天不是戰死這裡，明天也會戰死別處。」父親對日本人的印象並不差，他總認為「壞」的日軍是來自台灣或高麗（請讀者原諒，這是父親的印象）。

父親告訴我一個故事。某天日軍在台山處決一些村民，要村民排成一行，跪在一條小河前，面向河流，然後日軍用刺刀逐一在村民的背部插一刀，再順勢一腳把村民踢進河裡。父親的一個親戚也在行列之中，當日軍在其背部舉刀猛刺之際，這親戚奮力躍進河裡，日軍刺刀仍刺進了這位親戚的腰部，割開一個頗大的傷口。這親戚最終保住了性命，但腰部留下了一個頗深的永久疤痕。

香港日治後期，父親與母親「走難」返回廣東。祖父和大伯則留在香港。大伯是日治時期在香港餓死的，據說死後被人割去兩大片大腿肉。相信大伯的屍骸可能只是草草收殮，因為父親從沒有說過大伯的墳墓在那裡。

父親走難時時常在荒山野嶺的茅廁內或草叢裡，遇到一些衣不蔽體、瑟縮的傷病軍人，他們是由於生病、受傷或體弱，被上級取走號衣¹²，遺棄在野外。他們乞求走難的同胞施予食物。父親

說很多時根本是自顧不暇、有心無力。

可能由於眼看軍人受到如此待遇，父親不願當兵。父親曾經在走難之時被軍隊「拉伏」，要強迫入伍當兵。我不知道父親那裡來的智慧，在檢查視力時，標誌向上，他說向下，標誌向左，他說向右，結果被放棄了。

父親在走難前期的日子是頗困難的，沿路典賣衣物，甚至有一次用蚊帳欺騙別人說是紡紗，但在後期則比較舒適。事緣父親與一群難民一同走難往曲江¹³，因為水道比較方便和舒適，很多難民取道水道，但父親堅持走山路，只有一小部份難民與父親走山路。某天清晨，同行的一位難民跑來感謝父親，說父親救了他們一家的性命。原來前天晚上沿着水路走難的難民被盜賊劫劫，姦淫擄掠，無所不為，所有難民無一倖免。在這之前父親一直力勸他不要跟隨別人走水路，所以他認定父親為救命恩人。到了曲江，這人開辦了一所煙絲廠，聘請父親為廠長。這段時期父親的生活十分安定。這段時間應該是父親最懷念的日子，父親在離世之前，一直有一個心願希望可以重遊曲江，但由於身體狀況，一直無法成行。

抗戰勝利後，煙絲廠需復員，結業搬回廣州，這人給父親一筆頗可觀的遣散費。父親滿心歡喜回到香港，但已人面全非，找不到親戚朋友，流落街頭，而可觀的國幣在香港市值甚低，所謂「八年抗戰容易過，和平一日吊沙煲」，父親每日三餐皆是吃「馬蹄粉」，一些糊狀的食品，這是市面上最便宜的食品。如是者吃了一個多月。某天，終於在街道上遇到一位親戚，帶他回家安頓，問他「吃過飯未？」父親頓時淚如泉湧。自此以後，父親一直再也不沾「馬蹄粉」。

六、餘音

在80年代後期，父親曾經希望返鄉重建故居。當時我極力反對，表示我們皆不會返回鄉下居住，建了房屋只會讓親戚居住，反添不必要的麻煩。父親最後說了一句，「落葉歸根，呀仔。」當時不明白，現今深切體會，人總不能割斷自己的歷史。歷史研究也離不開人，離不開個人的歷史。

註釋

- 1 豪華戲院 (Hoover Theatre)，位於香港島銅鑼灣邊寧頓街，1954年開幕，現已拆卸並重建為百利保廣場。
- 2 香港殯儀館是香港島唯一的一所殯儀館，建於1930年代，位於香港灣仔道。1960年代搬往北角。
- 3 維多利亞公園位於港島銅鑼灣，啓用於1957年，是香港島最著名和規模最大的公園。
- 4 金錢村侯族是新界大族之一。
- 5 石湖墟位於新界上水，是由新界廖族和侯族等共同建造。
- 6 松柏塱村位於金錢村的北面，是一雜姓村落。
- 7 何東是香港著名的商人、買辦，在香港商界和政壇中具有很強的影響力。
- 8 金錢村何東學校旁邊就是何東所擁有的東英學圃，我們一般稱為何東花園。面積頗大，種了很多荔枝樹。
- 9 香港的國貨公司是有中資背景、主要售賣中國大陸產品的百貨公司，在六、七十年代，國貨公司是香港人接觸中國大陸產品的少數渠道之一。由於價廉物美，國貨公司的產品廣受香港人歡迎，其中一項幾乎是大部份香港人皆會穿着的就是校服。
- 10 1961年9月1日吹襲香港，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吹襲香港的最強颱風，共有183人在溫黛襲港期間死亡。
- 11 赤柱航海學校是一所初級海員訓練學校，所有學生都是清貧子弟或失學兒童，前身是在50年代的孤兒院，收養數拾孤兒，到了60年代擴展成為培養海員的專業學校，學生須在校內寄宿。
- 12 綉有軍人號碼的軍服，上級取去用以冒領軍餉。
- 13 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廣東省的臨時省會。

活動消息

卓越學科領域計劃：「中國社會的歷史人類學研究」

邊陲社會與國家建構研討會



日期：2012年11月25-26日
地點：香港科技大學教學大樓7341室

與會學者

James Robson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 Harvard University)	張兆和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
Paul Katz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連瑞枝 (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
王明珂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陳 瑤 (廈門大學歷史系)
何翠萍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陳麗華 (清華大學社會所)
吳密察 (國立成功大學台文系)	傅寶玉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中心)
呂永昇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黃永豪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李中清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蔡志祥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李文良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	謝曉輝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
林欣宜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	
馬健雄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	

查詢
電話：2358 7778 電郵：schina@ust.hk 網址：schina.ust.hk

合辦單位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學—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The UGC AoE Scheme: The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of Chinese Society

卓越學科領域計劃項目：「中國社會的歷史人類學研究」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香港科大霍英東研究院泛珠三角研究基地

合辦

第二十二屆歷史人類學研究生研討班

日期：2012年3月17日—3月18日

地點：中山大學歷史系（永芳堂）

2012年3月17日（星期六）

一、8:30-10:00

主持兼評論：陳海立（中山大學歷史系）

報告人： 陳嘉順（江西師範大學歷史系）

題目： 抗日戰爭與中等師範教育變遷：以韓山師範學校為個案

茶歇（10:00-10:20）

二、10:20-11:50

主持兼評論：李鎮（中山大學歷史系）

報告人： 柳一舟（南昌大學歷史系）

題目： 權力網路與民國後期的清江縣：以控告檔案為中心

午餐（11:50-12:50）

三、12:50-14:20

主持兼評論：馬健行（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

報告人： 沈文傑（廣西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

題目： 壯族雞卜的歷史記憶與當代傳承

四、14:20-15:50

主持兼評論：腰藍（中山大學歷史系）

報告人： 吳俊傑（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

題目： 跨省婚姻中的少數民族婦女：關於貴州布依族婦女的婚姻在浙江調試的個例研究

茶歇（15:50-16:10）

五、16:10-17:40

主持兼評論：彭琪庭（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

報告人： 朱艷傑（西華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題目： 川北「王皮影」研究

2012年3月18日（星期日）

六、8:00-9:40

主持兼評論：姚勇（中山大學歷史系）
報告人： 劉靈坪（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
題目： 洱海區域的歷史人群及其邊界：白族認同的歷史變遷研究

茶歇（9:40-10:00）

七、10:00-11:40

主持兼評論：潘艷勤（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
報告人： 覃延佳（中山大學歷史系）
題目： 師公儀式與地方文化建構：廣西上林縣西燕師公研究

午餐（11:40-13:20）

八、13:20-15:00

主持兼評論：徐靖捷（中山大學歷史系）
報告人： 侯娟（中山大學歷史系）
題目： 明清解州鹽池南岸村落體系研究

九、15:00-16:00

圓桌討論

主持人： 李曉龍（中山大學歷史系）
引言人： 所有報告人

《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讀者回條*

____更改地址

____新訂戶

姓名 (Name) : _____ 先生 / 女士 (Mr / Ms.)

服務機構 (Institution) : _____

通訊地址 (Mailing Address) : _____

電話 (Phone) : _____ 電子郵箱 (E-mail) : _____

*上述資料只用作華南研究資料中心系統通訊之用。

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

Fieldwork and Documents:

South China Research Resource Station Newsletter

徵稿啟事

- (一) 本刊由「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出版。
- (二) 本刊為季刊，每年出版四期。分別為一月十五日、四月十五日、七月十五日和十月十五日。
- (三) 本刊接受有關華南地域社會研究的學術動態介紹，包括學術會議、研討會紀要；研究機構、資料中心介紹；田野考察報告及文獻資料介紹等。
- (四) 來稿必須為從未發表的文章。
- (五) 來稿中、英文不拘，字數原則上以不超過五千字為限。
- (六) 截稿日期為一月一日、四月一日、七月一日和十月一日。
- (七) 本刊不設稿酬，來稿一經刊登，作者將獲贈該期十本。
- (八) 來稿可以原稿紙書寫，或以電腦文件方式寄本刊。
- (九) 來稿由本刊編輯委員會審閱。
- (十) 收稿地址：
 - (1) 香港九龍清水灣道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編輯部
黃永豪先生收
電郵：schina@ust.hk
 - (2) 中國廣州市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轉
《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編輯部
黃曉玲小姐收
電郵：hshac@mail.sysu.edu.cn